

聚焦文学新实力

张怡微,上海青年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复旦大学戏剧(创意写作MFA)专业硕士导师。出版有《细民盛宴》《家族试验》《樱桃青衣》等二十余部作品。

“家族试验”生长史

□陈芳洲

作家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类一出手便是仙人,梦游九州,所到之处留下传说般可望而不可及的灵光乍现;另一类则须克己苦修,于枯枝杂丛中捡起能够架设云梯的那支,然后一步一步地攀登登山。

张怡微似乎属于后者,十余年里,她一直稳定保持着作品产出。出版《细民盛宴》《樱桃青衣》《家族试验》等10部小说集和《都是遗风在醉人》《云物如故乡》《新腔》《旧日的静定》等7部散文随笔集。她的写作历程,几乎可以看作学习的历程。2007年,以校园题材的青春小说为主;而后,有意识地“想要素描上海家庭的伦理生活、年轻人的婚姻处境”;硕士毕业进入复旦大学文学写作专业,“知道了要建立认知与故事之间的桥梁”;博士接触明清世情小说,更加追求“找到最适切的取景框,表现生活层面的悲喜交织,而非纯粹的苦楚”。写作到达一定阶段后,再继续进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保持对创作的高度关切,直面自己的困难和混乱,提炼出一个高度理性的人格,去肯定或者否定自己。除此之外,最难的部分是作家在高浓度理性的同时,还必须保护自身高浓度的感性。张怡微显然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她在访谈《写作不是一件浪漫的事》里说:“写作本身能让你成长的东西是很难的。恰恰是你必须回过头面对那些事情,才是让你认识自己的时候。”

张怡微的写作生长基本适切于她的教育经历。其中,重要的成长节点发生在硕士阶段。考入复旦大学文学写作硕士的张怡微,听过两年王安忆教授的写作实践课,在理解写作时很受王安忆要求理性的影响。她认为,“身为创作者的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这位作家到底是怎么从素材中找到可以放到小说里的物质材料的,每个作家选择的材料都不一样。”博士阶段,张怡微参加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几个写作工作坊,在小说集《樱桃青衣》后记中,她从“台风笋”又联想到存在于汉语层次当中的文学可能性,并从“台风笋”和“台风天”的勾连中,理解到写作可以从更加平淡的路径中,对读者提出“自行调度日常经验”的友好邀请。此时的张怡微,已经更多地思考写作的风格与审美。

对写作的智性思考,使张怡微可以站在一个更具有统领性的方位上计划自己的创作:“这些年我一直有个写作计划叫做‘家族试验’,简而言之是想写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最终以一家人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尤其‘二胎’开放以后,实际上也意味着独生子女以集体的形式走入历史,这一代人在历史脉络中是暂时性的,这种暂

时也是伦理性的,很特殊的,所以就有了‘家族试验’。”对“家”的关注很早就出现在张怡微的创作中,而后“家族试验”的写作计划,是在她对写作和人生的思考中一点一点生长起来的。

“家庭”写作意图的第一次出现,是在200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梦·醒》中,她在序里写:“一直以来我都非常想写上海的家庭,上海的精细与深情”。彼时尚未对写作有许多智性思考的张怡微,对“家”的创作动机恐怕源于她对生长环境的直觉反馈。“我们所遭遇的第一个重大人生磨难多来自于家庭,多来自于与家人建立的关系”。《梦·醒》讲述了相识于网上的社交空间“微舍”的三组少年的故事。“微舍”实际上是作为逃离家庭的网络小家园,现实家庭各有隐患的三组少年在此相遇,分享一些有关家庭与成长的青春感受。因此,张怡微早期作品主要是从与她本人年龄相当的少年视角出发,以对家庭生活敏锐的感受力,在细小的情感缝隙里倾露少女的早熟与不安。

第二部长篇《下一站西单》则强化了破裂的家庭结构。主角林玮琦被父亲寄养在上海姑姑家,从小跟姑姑的孩子王乔一起长大,而姑姑曾经跟林母有过一段婚外情。在这样一个复杂破裂的家庭背景中,张怡微聚焦的是两个表亲姐妹之间的微妙关系,小时候的亲密也可以在长大后烟消云散,但一起成长的经历又使得她们始终在一个遥远的位置上似有若无地关注着对方,互相理解又不理解。在这个故事里,张怡微已经跳脱少年成长的伤痛,而借此质疑亲缘间所谓家庭关系的可信度。

这种独特的、不算友爱的姐妹关系延续到下一个长篇《你所不知道的夜晚》里。因为母亲偏爱妹妹,两个亲姐妹总是处在竞争对抗的明争暗斗中。“同床异梦”是姐妹俩的真实写照,就算是同床入睡的亲姐妹,也可以在最狼狽的时刻揭穿对方最脆弱的私密,张怡微在此确认了家庭成员间切实的残忍和敌对。

《细民盛宴》里,家族间的关系则从单纯的敌对转到更复杂的面向。生活中父爱长期缺位的袁佳乔,感情上是恋父的。她一直不动声色地渴望父亲的关注、肯定,屡屡失败后,把这种愿望投射到朋友小茂身上。袁佳乔爱小茂,不仅因为他单纯、天真,曾经在年少时站在她这一边,还因为小茂使她想到父亲。但当袁佳乔和小茂真正领受生活的困境时,小茂却一点点让袁佳乔心灰意冷。在父亲身上所求却又不曾满足的,但在《细民盛宴》里,袁佳乔在对家庭巨大的出走和反叛后,又以一种十分曲折的路径,完

张怡微在做的试验,是以“家”为单位对广袤庞杂的世界做切片,再用她独有的显微镜般细腻视角去观察描摹一些“不让人升华的真相”。她一直期待读者能看到她作品“背后的那个意图、同情”,“人情”的底色是她体验过的复杂时代。

亲做了决裂,她“不再爱他(父亲)了,胜过了对小茂的不爱”。

有意思的是,在体会过破碎的家庭结构、不可靠的亲缘连接、冷漠的家属关系,“懦弱男权”下“中国旧家族的伦理模式”等各种复杂家庭因素后,袁佳乔却在继父继母的身上获得了“家族”的肯定和接纳。小产后住在医院里,已经彻底不爱父亲也不爱小茂的袁佳乔先得到“梅娘”(继母)的探望,然后继父也过来看望。继父向乔乔转达了“梅娘”的评价:“她也说你你好”,然后再表达了自己的评价:“其实我和她一样,我也觉得你很好的”。袁佳乔也没有意料到,自己一直渴望的关注与肯定会在继父继母的身上找回来,“松懈了这些年来全部的逞强”。

这个细节的关键在于,进入家庭伦理内部的外来人员不再仅仅是某种让人略感膈应和尴尬的补充或寄托,而真正被吸纳内化为“家族”的一部分。成为家族一员的过程不是通过血缘形成的,而是主角体会到继父继母在一个不远不近的位置上,对她居然是关注、宽谅也共情的。正是因为继父继母的评价,彻底不爱的袁佳乔后来再跟父亲独处时,反而感到父亲身上笨拙幽微的爱,感到自己“对以往的误解那么深,以至于许多人都被我用力过度地看走样了”。张怡微自己也很喜欢这些细节,她在后记里写:“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少男少女时期就想好了,未来我要当一个好继父、好继母,这也是我到了而立之年才有的体会。”

在《细民盛宴》之前,张怡微笔下的人物经常是对家庭有所要求却又不曾满足的,但在《细民盛宴》里,袁佳乔在对家庭巨大的出走和反叛后,又以一种十分曲折的路径,完



张怡微

成对家庭的情感回转。这一步,是她“家族”思考里重要的一步,是她借助袁佳乔回看和重评家庭的过失,以理解、以释怀。但在这当中的家庭伦理还是复杂的,表面上看,似乎终于达成一个小家内部的团圆。但细想下来,“命运的强力、伦理的无奈促使这些小型的团圆是那么摄人心魄,又看似是那么平常”。

“家族试验”的写作计划里还有许多不能忽视的中短篇。《最慢的是追忆》讲少女对继父血淋淋的防备;《我真的不想来》是对亲情胁迫的微弱反抗;《试验》讲“老来脆弱、单纯,也是无奈的一面”;《春丽的夏》有再婚女性对母亲、丈夫与女儿“生命三角地的安宁”等等。把这些篇目凑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初露尖尖角的细杂而宏大的“家族试验”。在这个计划下再去看看张怡微的小说,便很难只是将它们放在“世情”的领域下去考量。事实上,张怡微的“家族试验”是把“家作为理解世界的一种基本模式”。她在做的试验,是以“家”为单位对广袤庞杂的世界做切片,再用她独有的显微镜般细腻视角去观察描摹一些“不让人升华的真相”。张怡微一直期待读者能看到她作品“背后的那个意图、同情”,“人情”的底色是她体验过的复杂时代。

在作家人格的完成路途上,张怡微还有敏锐的观察思辨和强力的成长意志。她的写作在“家族试验”外,还涉及到年轻人的婚恋、少数族群的困境,以及现代机器人造成的种种影响,可以看出,她的写作始终是与她的思考和成长相关的。读者如果能发现她的敏锐与强力,便会从她瘦弱的身躯里获得强大的力量,也会对这位还在强力生长的作家充满期待。

创作谈

从17岁在《萌芽》杂志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我写了百万字的小,大部分作品并不值得出版,但对曾经学生时期的我来说,是一种文学上的鼓励。这并不是自夸或者自谦,只是一段跌跌撞撞的经过。我无法修正走过的弯路,但总的来看,也算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的经历令我相信,写作是可以训练和学习的。如果没有文学写作,我的生活一定会黯然得多。在许多已经走出的情感困境和释然的童年痛苦中,是文学解救了我年轻的我。

我的父母都是工人。在曾经的上海,工厂制造的商品无处不在,工厂也缺乏新奇感。同学的父母,有的在柴油机厂工作,有的在钢铁厂工作,或在钢厂,仪表厂,再早一点,我的外婆曾在纺织厂工作。我最熟悉的家庭生活,就是工人家庭的生活。读《繁花》时,读到工人阶级最喜欢红木家具和王盘声的唱片,的确是这样。后来又读到玛丽莲·亚隆的《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书里写女工的友谊发生在生产、生病和有人过世时,更觉得准确。这个工业的时代在上海历史上并不算长,它曾经是我童年记忆的全部,也是观看世界的基本模式,直到它悄悄过去了,才发现我并不理解它。因为写小说的关系,我才记录了一些往事。回头看看,会发现这并不算是“文学上海”的主流,只是一个声部,代表着婚姻私事化、独生子女、拆迁及房屋商品化等政策的影响,我写了一点上海工人家庭的生活史。

我有几个朋友也写上海,比如王莫之,写知青子女与上世纪90年代上海摇滚乐的发展史。又如路明,写知青后代和三线人的故事。他们都很优秀,通过努力,默默地回到了上海工作,再也不用“去上海看外婆”,就好像真的出生在上海一样。如果没有文学,就不会有人知道他们对于这座城市复杂心酸的童年情感。他们把自己百折不挠的认同决心,用非凡的抒情能量掩盖了起来。这种勤劳的、压抑的感觉结构和行为模式,我的身上也有。我们写得很认真,过得也是普通上班人的日子,挤出时间来写一点故事,并不太忍心批评上海,像一种诗化的软弱。还有一些更硬核的写作,比如擅长写建筑的王唯铭、留法博士杨辰书写的《从模范新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他们都是“新村里的海德格尔”。

从女性角度写作的也有好几位,都是我的同龄人,都受到了非常完整的教育,对于逝去的一切都倍感珍惜,生活在其中时,又充满痛苦。我的小说从《家族试验》到《细民盛宴》,几乎就是这类苦恼的总纲。以普通工人后代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照护,上学、上补习班,还能学习一两门乐器,还有机会外出深造。如果没有文学,我们的“不满足”可以被理解为“贪心”。文学收留我们的欲望,并加以照亮。有如康拉德所言,“我试图要达到的目的,是通过文字的力量,让你们听见,让你们感觉到,而首先,是让你们看见。”这意味着,“在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和作为接受的观众(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感情上的联系”(布鲁斯东《小说到电影》)。这种心灵关系,是我以及和与我相似出身的同龄者们携手创造的新世界。它一定不是真实,也不具备修改历史进程的雄心,但它反映了我们心灵深处的渴望。和历史中那些枯燥的工人家庭的刻板印象不一样,我们有那么强烈的感情、那么深沉的欲求,在文学中开辟出一个理想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起点是家庭,边界却不知道在哪里,也许在虚拟世界,也许在多重宇宙。也许书写家庭的初衷是为了反家庭,但它自由下行,兢兢业业地抒情,最终,又回到了对“家”的沉思中。

《细民盛宴》《家族试验》《樱桃青衣》,令我完成了情感意义上的自我成长。在文学的道路上,我是非常幸运的人。我还在写一些新的东西,也许再过十年,当下的生活“宇宙”又会再度丧失唯一性。一切都可复制、又不复存在,我们的生活历史都被凝结成艺术作品。

家族生活的多重宇宙

□张怡微

短评

在现实与想象之间跃动

——“第36届青春诗会诗丛”简评 □曾子英

《诗刊》社与长江文艺出版社于2020年12月推出了“第36届青春诗会诗丛”,15位诗人各具有一无二色彩。诗人中最大的40岁,最小的26岁,他们中有警察、有农民、有老师、有记者、有编辑……有的诗人在创作上已趋于成熟,有的还在慢慢学习和摸索。这15本诗集在集中展现15位青年诗人写作成果的同时,也为当下青年诗人创作的内容与走向提出了新的思路。

吴小虫的诗歌里有一种禅意,“古寺”与“品茗”常常在他文本中出现,他可以从一切微小事物中无限地开掘他的内在世界,他的语言是平静的,内在却是激越的。正如他自己在诗中所写,“如果在坠落的过程中能毫不害怕/滔天激流中我必将凭跃和鸣叫”,在一社不动声色里隐藏着暗潮涌动。

李松山的诗集《羊群放牧者》围绕自己的生活展开,他写放羊、写草木、写蚂蚁、写露珠,写一切在生命中构成微澜的意象。他在创作中打开了所有的感官,微小的生灵在他笔下都鲜活起来,从平淡的文字中流露出对生活的热爱,不经意间就能触动读者内心的柔软之处,使他的诗进入一个更为广阔境界。

王二冬和芒原分别以他们故乡和故乡的代表性意象为题,《东西西营》和《酒渔(烟柳)》是他们的乡愁,也是他们展开诗歌创作的文学坐标。两位诗人一北一南,笔下的故乡各具特色。芒原试图用一种“粗粝的隐秘”打通现实与自我的关联,作为一名警察,这些年想必也阅尽了世事人心,在阅读中能感受到他笔下的故乡有一种“绝处逢生的真实感”。王二冬则选择用平实的意象去呈现自己对故乡的微妙情感,少年的英武稚气,在一次又一次同故乡的别离后获得平静,对故乡的深情感怀最终被隐秘地藏了起来。

一度的诗总是和他行踪发生密切的关联,大部分都像是在“途中”而忽然被打断格局,可能是在上下班途中、旅行途中。但他无意描述他在“途中”见到的所有宏大风景,他总是于广阔中找到一处指向内心的落脚点,适时地发出一些“清脆的回响”。

叶丹是兼有眼观于外和观于内的诗人,诗集《方言》显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冷静和克制——对词语的精准处理,专注于语词工整表达,给人一种他正退居到越来越隐蔽的地方来观察这个世界,给“隐秘的观察者”而“隐秘的观察者”角度也预示着某种创作上的生长性,一方面给予日常生活更多的精神内涵,另一方面有意识地将创作从琐碎的现实挣脱出来。

陈小虹对日常与生活有着精妙的观察和想象,她的每一首诗都像她内心的柔软释放,她不断寻找自己与世间事物之间的共鸣,触摸它们之间微妙的关系。正如她的诗集名字所

■新作快评 杨晓升中篇小说《海棠花开》、《小说月报》2020年第11期

四合院里“和”的丢失与复归

□范咏戈

四合院作为中国传统合院式民居,仅在北京已有3000多年历史。四合院体现着中国式“住文化”:一家人围合而居,除了上敬老下爱幼,兄弟之间便是“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传统民族美德这条纽带维系着华夏民族几千年不灭不败,然而现代社会却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撕裂了。寻找传统美德并呼唤其回归,在文学是情怀,是有价值的主题,这也正是杨晓升中篇小说近作《海棠花开》的旨归。

《海棠花开》的故事并不复杂。在某名牌大学任教的赵教授家住在一个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院门开在东南,不与正房相对,据说这是根据八卦的方位。正房坐北为坎宅,坎宅必开“巽门”,“巽”为东南方,又据说门这样开才能财源滚滚,所谓的“坎宅巽门”。这样看来,赵教授的四合院分明是个吉宅。而住在其中的主人也被认为是吉祥圆满,赵教授老夫子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大赵、小赵,后来他们各自娶妻生子又为赵教授各生了两个第三代。这一大家子人家加上儿媳、女婿,十口之家,十全十美。然而,现实却有些骨感:生在诗礼之家的赵家两兄弟本应不负父母期望认真读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读下去的,可是贪玩顽皮的哥儿俩并不是学习的料。更让赵教授头痛的是俩儿一直互相掐架,全无兄弟情分。哥俩勉强读完高中后考大学根本无望。此时到了1955年,赶上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赵教授便生出将他哥俩送一个下乡的念头。去谁留谁,最终兄弟俩通过抓阄老大下乡去了湖北黄冈。大赵带着满满的怨气一去几年几乎与这个家断了联系。待老教授两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到老大所在的湖北农场,方知大赵已经在当地娶妻生子。老二虽留在北京,终因文化低只能进工厂当了一名普通修理工,后娶了一名纺织女工。1977年老大考来运转:他的两个儿子争气、争光,一个考上清华,一个考上北大。随后下放湖北的老大又按政策回城,回到北京又住进了四合院。父亲赵教授高兴,专门在全聚德订包房全家聚餐,四合院的人气到了顶峰。然而这人气骤升却是表面的,随着赵老爷子和老伴儿先后过世,四合院里兄弟两家人互相看着不顺眼,一个屋

檐下却过得形同路人。甚至为了分得父母遗留下的正房大打出手,上演着一出“兄弟阋于墙”的闹剧。大赵和小赵“斗气”是自以有“底气”:大赵的两个儿子去美国读书后留下工作,收入不菲又很孝顺,不断寄钱回来,老大的日子“富得淌油”,喝茅台、吃龙虾,物质上进行着报复性的享受。相反,对门小赵家虽然经济条件一般,却看不惯小赵“咸鱼翻身”的老大家的“得意”。两家过上了赌气、憋气式生活。也许正应了风水轮流转那句话,一天,大赵茅台喝多了突发脑溢血。此时倒是他的晚辈大赵的侄女和侄女婿把他送到医院抢救才保住一命。事情的转机在于病中的老大终于悟到“出多少钱请保姆都不如亲情”。祸不单行的是,老大家的一个儿子在美国得了新冠英年早逝,他则终日与轮椅为伴,经历了命运的捉弄,四合院总算重新平静下来。

不难看出,小说作者很善于经营故事形态,以“小切口、大社会”展开叙事,四合院时空成为一个发散性的结构,连着社会——从湖北农场到北京市井;连着世界——从北京到美国旧金山、洛杉矶。时空跨越70余年,三代人经历了50年代、六七十年代“文革”直到改革开放和当下新冠肆虐,堪称当下社会的一个缩影。写小说讲究“枯树开花,一园锦绣”,“枯树开花”搭架子,作载体,重要的还是让人看到里面的“一园锦绣”,就是常说的小说的“意思”。这部小说的厚重之意在于告诉人们兄弟齐心,其利断金。故事中这一场“轮回”称得上气象万千,当“和”气再次走进这座四合院里,海棠花也如约绽放了。读《海棠花开》获得的是一种浑然和谐的审美享受。这大半是因为作者找到了一种与故事主题相吻合的语境和获得了叙述方位的自由。人物刻画、作者旁白如榫卯契合少有脱榫之笔,犬牙交错并无错位之嫌,整体上洋化蔚圆。半个多世纪的时代变迁,赵家三代人的恩怨,浓缩进一座老北京“巽”门四合院,行云流水的日常叙事中不乏兄弟相杀相爱的开合、波瀾,揭橥的是人性中“孝”“悌”的丢失与回归。结尾,在一个又见的暮色合中,赵家的主人奏起了老北京平民生活的新篇章,给人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